



香港亞太研究所

亞太轉型、區域成長圈 與永續發展

蕭新煌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15.00
ISBN 962-441-055-0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亞太轉型、區域成長圈與永續發展

蕭新煌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亞太轉型、區域成長圈與永續發展

作者簡介

蕭新煌。台北市人。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主持人、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蕭新煌 1997

ISBN 962-441-055-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摘要

從二次大戰後到一九九零年代中葉，亞太地區陸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四波發展大轉型。第一波始於一九六零年代的日本現代化；第二波是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後繼興起的台、韓、港、星「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蹟；第三波是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在中國沿海和東南亞所展現的強勁成長潛力；到了一九九零年代，第四波則是跨國、跨區域的成長圈（成長三角）的出現。

本文回溯了前三波亞太大轉型所帶來的亞太形象提升，也分析了隨伴這三波轉型所形塑出現的亞太民間社會多樣化發展態勢，亦評介了構成第四波轉型的十一個區域成長圈的內涵及其潛在的功過。在結論中，本文更提出了永續發展新典範的四個共識和原則，期許亞太各國的民間社會能在區域政治力（政府）和區域經濟力（財團、企業）之外，發揮監督、匡正和制衡的區域社會力，以引導第四波亞太轉型能走上永續發展之路。

三波亞太轉型

自一九八零年代初以來，亞太地區發展的國際形象開始有了轉變，在過去的十六年裏，亦見愈來愈多國際性組織的報告和學術著作着墨於亞太的發展經驗。先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先後用「半工業國家」（semi-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和「新興工業國」（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的概念來概稱包括台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在內的東亞四個快速成長的社會。這是繼日本成功的「特例」之後，另外四個備受矚目的亞太發展奇蹟。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中葉，上述甫被國際發展學者發現的東亞四小龍加上日本的發展經驗乃一併被國際間稱為不可抗拒的「東亞銳鋒」(Hofheinz and Calder, 1982)，不但視之為自成一格的「東亞發展模式」(Berger and Hsiao, 1988)，更從寬廣的世界發展史觀來看待此於二十世紀後半期東亞社會所孕育出來的「第二類型現代化」(Berger, 1986)，甚至以整個人類社會文明史上「現代中心」的第五次「西移」易動來詮釋東亞的崛起(Tiryakian, 1985, 1990)。對當代西方社會來說，突出的東亞發展經驗已讓他們重新認識亞太的潛力和發展契機(Aikman, 1986)，更導致西方社會科學已有的左、右派發展理論和典範分別面臨挑戰而自我修正和調整(Hsiao, 1992)。當全世界都在重新「認識」和重新「解讀」這先後兩波東亞的發展浪潮之際，在亞太內部又開始湧現了另外兩股發展的浪花，一是中國大陸，另一是東南亞。

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中末期，經過十年的經濟開放政策，諸如經濟特區的設置、沿海城市的發展，以及三個三角洲地區(長江、閩南和珠江)的擴張成長，中國大陸已儼然躍升成為另一個亞太經濟的新生力量。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化轉型契機和它展現出來的市場潛力，使得全球資本和投資紛紛湧入，此一「後共產主義」國家一時乃成為亞太的另一條大龍，甚至被視為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竄起的另一「準核心」(Hsiao and So, 1993)。

另一方面，位在亞太東南那一大片的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也在八零年代有了令人矚目的表現，出口導向的成長策略和它帶來的高成長率是展現出來的經濟魅力。不論是中南半島的泰國、越南，或是海洋的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均在一九八零年代後期一改之前它們留給西方的低度發展和落後形

象，代之的是內部經濟活力的展現和對外經濟、市場和資源的開放，這在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三國尤為明顯，而甫走進市場開放和經濟改革之路的越南也逐漸受人注意(McCord, 1991; Naya and Takayama, 1990)。

換言之，到一九九零年代初，亞太的整體形象已有了相當的改觀，主要是來自三波的發展浪潮所激盪的結果：第一波是一九六零年代日本竄起所帶來的亞太特例衝擊效果；第二波是一九七零年代後繼興起的台、韓、港、新「東亞四小龍」和它們創造的奇蹟；第三波則是一九八零年代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所突顯的另兩股強勁的成長動力。

在這三波亞太經濟成長動力湧現的同時，也讓全球目睹了整個亞太地區的政治轉型和社會多元化。第一波的日本已建立起議會民主的常態制度，第二波的台灣和南韓也成功地從長期的威權政治體制轉型過渡而進入民主鞏固階段；新加坡從穩定的形式議會民主制度轉變到「實質」的民主體質道路上，雖未見可觀的進展，但在「後李光耀」時代裏，倒也多少有了若干轉機。香港在一九八零年代中後期以來，由於面對一九九七大限的迫切感下所擠壓出來的中產階級民主運動，雖未能對中國的接收政策構成具體的影響，但至少孕育了前所未有的草根民主政治組織。至於第三波的中國和東南亞雖同樣經驗着程度相當的經濟轉型和成長的大趨勢，但政治民主化的步調卻有不同的進展。中國大陸的開放和經改雖未因此帶動民主制度的落實，但中央對地方的政治控制卻已有了鬆動的現象，但公民權的爭取和保障仍將有一段艱苦的路要走。泰國持續有着大致穩定的議會民主體制，政黨權力的轉移已不致造成巨大的政治社會不安。菲律賓的民主化轉型較明顯也最戲劇化，馬可仕政權在八零年代末期崩潰當是最令人矚目的民主轉型指標。馬來西亞一九九五年大選結果，對走出種族政治衝突的陰影和營造以協商取代對抗的民主政治氣氛是有所俾助。馬哈迪首相的國民陣線大贏似乎鋪下「後馬哈迪」政局的大致佈局，同時也反映

了馬國人民對「二零二零宏願」號召的期待。相對地，印尼的政局則似乎日益籠罩在「後蘇哈托」政治前景的不確定感之下，這對印尼的政治變局固然是一個不可測的變數，但樂觀的觀察者則視之不失為一可能走向民主轉型的契機。相對來說，越南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過渡對政治控制的開放和放鬆，柬埔寨在聯合國監督之下，於一九九三年五月舉行多黨派選舉，成立了新政府，則有了一些逐步出現的進展；與緬甸、寮國和柬埔寨的封閉軍事統治來說，倒也是另兩個在亞太可被期待的緩慢民主轉型個案。

亞太「民間社會」的多樣化發展

如果再就經濟發展和政治轉型雙重過程隨伴而來的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興起現象來看，東亞的日本、台灣、南韓可以說已形塑出「要求甚苛」（demanding）的跨階級民間社會，在國家和社會的權力關係上也建立某種比較平衡的關係，民間社會改造國家本質和行為的力量更不能忽略。所謂的「民間社會」指的是在國家機器直接控制之外的各種社會、經濟、文化和宗教的團體和組織。用民間社會此一概念來涵蓋上述種種在政府之外的社會結社和組織，所強調的是它們共同具有的民間性格（civility）。

香港在短短幾年內經歷了從甦醒到挫折的戲劇化過程。因為香港面對的是國家政權的大轉移，而且是從一個比多數港人都先「在地」卻始終與香港社會疏離、難以生根的英國殖民政權過渡到一個道地「外來」而又陌生的中國政權，民間社會既「無意」花心思與即將撤退的英國政府周旋對話，卻又「無力」左右將強勢入主的北京政權。在面對兩個性質不同但都未「本土化」的國家體制時，香港民間社會徒有動員之勢，卻無制衡國家之力，難免陷於挫折的結構原因即在於此。新加坡長期有着強而有效率的官僚威權國家，民間社會也始終難有集結、動

員和茁壯的結構條件，因此縱使近年來新加坡中產階級開始在選票上表現出不滿的集體反應，但民間社會仍然停留在無組織，而且缺乏動員力的消極形態。

中國在走上開放經濟轉型的途中所發生的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雖被部份樂觀的觀察家視為中國民間社會再生的指標，但悲觀的觀察家則質疑此一失敗且導致血腥鎮壓的學生、都市知識份子和部份都市勞工的民主運動，到底有多少實際的民主改革作用？中國社會裏的一般人民，尤其是內陸農民，又到底對此運動有多少認識和支持？但務實的觀察家大概不會完全抹煞在鄧江體制下的經濟改革路線，確實提供了「有限」民間社會成長和擴張的經濟和政治空間，只是北京政權始終不肯接受和面對來自初生和有限民間社會的呼籲和要求。天安門事件對萌芽的中國民間社會發展確實有着莫大的傷害，不過在沿海，以華東和華南為主的區域，倒是持續地出現若干立基於經濟活動的民間社會再生的現象，值得我們注意。雖仍相當微弱和難有真正獨立的影響力，但只要「後鄧時代」繼續走經濟開放的路，這些在沿海華南較現代、較發展的地方社會將不可避免會出現較其他地區來得制度化和較有動員力的多元民間社會組織（Hsiao, 1995）。

如果以在日本、南韓、台灣已儼然成形的民間社會，在香港經歷被動甦醒和挫折的民間社會，在中國初生和有限的地方型民間社會，以及新加坡雖有不滿卻仍難有動員力的消極民間社會等六個個案，來做為當前亞太民間社會性格的幾個東亞類型，那麼在東南亞其他經濟轉型和政治變遷均屬於後進的各國或許在未來幾年會逐漸體現出可與上述幾個東亞經驗相對照、相類推的民間社會興起或再生的跡象。譬如說菲律賓在可觀的民主轉型過程中，就已多少突顯出日益組織化和求變心切的民間社會力量，其中教會、企業、都市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和勞工均扮演著程度不一、作用不同的促成角色。同樣地，在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這三個已展現發展潛力的東南亞國家

裏，也有為數眾多的非政府組織、社區動員團體、以宗教或族群為基礎的社團，以及非營利慈善基金會等的存在，這些也多少提供了我們可以給予密切觀察的民間社會成份（Yamamoto, 1996）。

從日本到菲律賓，或是從南韓、台灣到馬來西亞的亞太各國，我們都一再目睹一連串因前三波經濟轉型和不同速度的政治民主化浪潮，而展現組織化程度不同、積極性格不一、制衡國家力量相異的多樣化民間社會的成型或雛型，至於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和汶萊這五個東南亞國家，則恐怕在可見的近年裏，都還較難有任何足以孕育出本土民間社會興起的契機和徵兆。

亞太區域成長圈：第四波

前三波的戰後亞太經濟政治轉型，使得亞太社會有了徹底地自我改造的機會，更促使整個國際社會對亞太的感觀和印象有了莫大的改變。從外顯而易見的經濟成長、貿易活動、都市發展景觀，到可察覺的政治權力轉變、民主制度的落實，再到只有深入和細心體察才能感覺出來的草根社會活力，都在在展現出三波亞太轉型的不同軌跡。這三波轉型的確也突顯了當前亞太區域發展內部的異與同；同的是各國都已有了動態的多元發展力源，異的是各國在轉型發展過程中，因內在條件和結構，外在環境與「時機」的不同，而形塑出三波和三類型的發展模式。整體來說，目前這三波（類型）之間的差距，有逐漸縮小的趨勢，其主要原因乃來自第三波的中國（華南）和東南亞強勁成長的追趕所致，而原屬第二波成長的香港一旦在一九九七年納入第三波成長的中國之後，香港和華南的經濟整合將又會呈現怎樣的發展形態，更是有待觀察。不過可以預測的是，當華南名正言順地收納了香港之後，其成長趨勢將會是亞太不可小覷的經濟力量。

事實上，香港「納入」中國華南經濟成長圈的「版圖」，不必等到一九九七年之後，從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以來，就已是事實。這也正是接下來要討論的，亞太發展的第四波趨勢，亦即區域成長圈（或稱成長三角）的出現。

前三波轉型均在單一國家境內發生，而且在經濟聯結上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西方核心的關係也遠較與亞太區域內跨國、跨區域的關係來得密切。但是第四波轉型的區域化成長圈則都立基於亞太內部跨國、跨區域的資本、技術、人力和市場的聯結之上。

（一）華南經濟圈

華南經濟圈是第一個成形的區域成長圈，大概是在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出現。這包括兩個小的區域成長圈，一是「珠江三角洲成長圈」，二是「閩南成長圈」。前者主要是集結第二波的香港和第三波的廣東兩地資本、勞力和土地所形成的次區域成長圈；後者則是集結第二波的台灣和第三波的福建兩地資金、勞力和土地形成的另一個次區域成長圈。此一華南經濟圈還曾一時被許多觀察家視為是「大中華經濟圈」的成形。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區域成長圈雖處在第三波的中國，但卻是吸引了第二波的香港和台灣私人資本所構成的第一個亞太第四波的發展力量。由於廣東、福建本就是東南亞華人的僑鄉，因此這兩個成長三角的發展過程也吸納不少東南亞華裔私人資本的投入，更十足突顯出此一區域成長圈的特色，以及中國官方招商政策和港、台、東南亞華人私人資本這幾個角色之間的積極互動關係。

（二）長江三角洲成長圈和環渤海灣成長圈

這兩個區域成長圈同時在中國東南沿海出現，華東的「長江三角洲成長圈」，以上海浦東特區為發展的主力，也集結了中國官資，台、港、東南亞私人資本，甚至為數不少的西方資

本。華北「環渤海灣成長圈」的特色則是日商和韓裔已佔有先機，而中國在渤海地區已有的工業和科技實力，將可能使得此一成長圈發展出結合第一波日本、第二波南韓和第三波中國，而孕育出以科技工業和製造業為特色的另一個亞太區域成長圈。

從華南、華東到華北這三個都位在中國境內沿海的區域成長圈的成形擴大，以及它所集結、吸引和動員到的其他亞太資本來看，不難看出在第四波的亞太經濟轉型動向裏，中國將扮演著吸納前三波亞太成長所累積資源，而有後來居上的有利角色。

接下來的另外三個新興區域成長圈則分別在一九八零年代末和一九九零年代初，經由跨國的共同開發協定所促成。與前述四個在中國境內沿海冒起的成長圈不同的是，這三個通稱「東南亞國協成長三角」的區域經濟整合的計劃均是在國與國、政府與政府之間政策的主動促成下所推動的。依時間順序，又可分為「東協南部成長三角」（一九八九年），「東協北部成長三角」（一九九零年），和「東協東部成長三角」（一九九三年），茲分別簡述如下：

（三）東協南部成長三角：新加坡－馬來西亞柔佛（Johor）－印尼廖內（Riau）

在一九八九年由新加坡所倡議之此一「成長三角」計劃，是一個國家級的合作計劃。其構想是由新加坡提供人才、資金和技術；馬來西亞柔佛州提供運輸條件，並具備製造中、高級產品的能力；而印尼的廖內省則提供多元的產業條件及充足的土地與廉價勞力，如巴譚島（Batam）以吸引電子業為主，平譚島（Bintan）則以觀光和勞力密集產業為主。

（四）東協北部成長三角：馬來西亞檳城（Penang）－泰國南部－印尼蘇門答臘棉蘭（Medan）

此計劃在一九九零年左右提出，成長圈包括馬來西亞檳城、泰國南部與印尼北部蘇門答臘之棉蘭。由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檳城來帶動泰南和印北的發展。其間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也積極投入，欲促成此跨「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成長三角」的開發。此一計劃亦希望藉這三個區域不同資源的互補性，來共同達成跨國區域化成長圈的共榮發展。

（五）東協東部成長三角：菲律賓岷答那峨（Mindanao）－印尼蘇拉威西（Sulawesi）－東馬來西亞（East Malaysia）－汶萊（Brunei）

此計劃最早構想是由菲律賓總統羅慕斯在一九九三年時提出，經由東協經濟部長會議討論同意後成立。其涵蓋的範圍包括菲律賓的岷答那峨、印尼的蘇拉威西、馬來西亞的砂勞越和砂巴，以及汶萊。此一區域預期可開發成多功能的觀光、交通、農業和海洋資源中心。同樣地，亞洲開發銀行也在促成和協助此一成長圈的實現。

在上述的三個東協區域成長三角的成形過程當中，台灣對其中的南部和東部兩個成長圈都分別已經投入或正在評估參與開發投資的可行性。

（六）蘇比克灣成長圈

另一個在菲律賓出現的蘇比克灣成長圈，則是一九九二年由菲律賓總統羅慕斯宣佈該灣為「經濟特區及自由港」掀開序幕，主要是由菲律賓和台灣合作的一個在菲律賓境內組成的區域合作成長圈。在台灣官方的經濟部主導下，一九九三年台灣的中國輸出入銀行已和蘇比克灣管理局簽署「蘇比克工業區開

發計劃」，台灣參與此一成長圈開發的舉動，更在當時被稱為是台灣官方推動「南向政策」的第一砲。

最後三個分別位於亞太北端、東南和南端的大規模流域及海域成長圈也逐步從倡議、規劃而走上實現的階段，它們分別是「圖們江流域開發計劃」、「黃金四角：湄公河流域經濟區」和「南海海域共同開發」。

（七）圖們江流域開發計劃

一九九一年時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所提出的亞太區域發展方案，促成中國、北韓、俄羅斯、日本、南韓與外蒙古六個國家共同開發圖們江，是東北亞首次出現的跨國（政府）經濟合作組織。這個成長圈的範圍約兩百平方公里，區內人口在一億五千萬左右；這項計劃將在二十年內耗資三百億美金完成，以貫連歐亞地區。

依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規劃，圖們江發展的初步是以琿春—雄基—波謝等為主軸的「小金三角」，進而擴及包括中國吉林省、朝鮮兩個道及俄羅斯一個區域在內的圖們江流域。

（八）黃金四角：湄公河流域經濟區

亞洲開發銀行在一九九四年所提出之「湄公河地區經濟合作擴大綜合計劃」是此成長圈的藍圖，包括的國家有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與中國大陸的雲南省。泰國、柬埔寨、寮國與越南四個下游國已經合組「湄公河委員會」，中共與緬甸也表達加入之意願，根據湄公河委員會之規劃，大湄公河流域計劃將首先着重於水、陸、空交通以及能源的基礎建設，接着將在觀光、環境、貿易等領域發展。在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與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積極參與和協助下，丹麥、瑞典、荷蘭、日本、南韓與新加坡等十多個國家，已允諾資金援助。

（九）南海海域共同開發

南海是由兩百多個大大小小的島嶼和暗礁所組成，位居主要交通線上，有戰略價值，亦有豐富的礦物、漁產資源和石油；而南海主權爭議向來是亞太地區安全的重要議題。涉及南海主權爭議的國家有中國、越南、台灣、菲律賓、汶萊和馬來西亞等國家。一九九零年中共總理李鵬訪問新加坡時，表示「中共願意暫時擱置主權問題，和東南亞國家共同開發南海資源」，一九九二年東南亞國協第二十屆外長會議簽署「東協南海宣言」，自那年起，東南亞國協外長會議也都表達類似的立場。

永續發展的國際合作展望：

對第四波亞太轉型的評估

結合亞太區域內較先進國家之技術及資金，與較後進國家之勞工及天然資源的新區域合作模式，亦即成長圈（三角）的形成，近期以來有方興未艾之趨勢。區域經濟合作（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的確有取代全球主義（globalism）形成為經濟發展的趨勢，特別是以地緣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區域經濟合作做為對外競爭的籌碼，更有可能成為世界新經濟秩序的主要經貿發展模式。而亞太的第四波轉型又正再次展現出有成為世界潮流銳鋒的實力。

在全球「塊狀經濟」蔚為潮流下，亞太地區的成長圈發展模式則是一種非正式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由較先進國家提供資金、技術給鄰近的後進國家，而較後進國家則提供勞力與天然資源，彼此互補。因為沒有正式的約束協議，且組織形狀大多呈現三角形，以帶動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為目標，而稱為成長三角。Scalapino（1994）將之稱為「自然經濟圈」（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 NETs），是結合區域內跨越疆界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本等而形成，亞太的各個自然經濟圈不但涵蓋

中國大陸的沿海地區，如廣東—香港—福建—台灣成長圈、長江三角洲成長圈和圖們江開發區；也涵蓋東南亞國協之東、南、北三個三角成長圈；以及湄公河金四角成長圈等，這些自然經濟圈，都跨越各國單一國家主權之外。

亞太的區域化成長圈與正式的區域經濟整合之組織規範不相同，後者一般稱為「塊狀經濟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歐洲聯盟」、「東南亞國協」及南美洲的「南錐共同市場」等。塊狀經濟體最主要目的在於結合組織內的國家經濟力量，消除內部的關稅和貿易障礙，促使組織內部的經貿順暢，在進行成員的經濟力量整合時，貿易趨勢將轉變為自給自足方式。因此，從現有的資料中可明顯看出，美國與加拿大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不僅美國對歐洲的貿易總值逐年下降，與加拿大的貿易則日益增加外，美國單單與加拿大的貿易總額，幾乎是和歐洲主要國家的總和，可見塊狀經濟體的威力。同樣地，「南錐共同市場」內部成員的相互貿易金額，佔該市場對外貿易總額比例，亦由一九九四年的10%驟然提升至當前的25%。自給自足是塊狀經濟體整合內部力量的必然趨勢，誰也阻遏不了。

另外，再拿「東南亞國協」近年來的金融開放措施來看，為避免他國進入分享組織成果，至今仍採金融管制政策，或者限制外資持股最多只有兩成。這些都是塊狀經濟體限制非成員的慣用作法，一旦被摒除於外，要與這些成員從事貿易，則會是事倍功半。

而在上述塊狀經濟體之外，亞太地區因政治環境的糾葛，不易在短期內有重大改變，乃新創了「區域成長三角」的模式，此一模式被認為是亞太跨國界成長的未來發展模式。成長三角之經濟發展形式之所以會出現，有的學者以為是因為亞太若干封閉社會主義已被務實的發展觀念所取代的結果（Scalapino, 1994）。但也有學者批評這將是半邊陲國家（如香港、新加坡、台灣），為了自身的工業重組問題，而倡議或積極參與這種邊

界經濟整合的成長三角策略，因此這種經濟整合基本上有「剝削」鄰國大量便宜勞工及自然資源來解決區域內較先進國家自身經濟問題的不公平現象（Ho and So, 1995），或是導致成長圈內不同國家內部利益分配不均的扭曲效果，甚或造成非法外勞、童工被剝削等內部社會問題。不過，從以上這十一個區域化成長圈的成形簡述看來，「扭曲論」和「剝削論」的質疑固然值得加以重視和防範，但事實上可能也不會那麼宿命和悲觀。就像亞太第二波轉型的東亞四小龍所展現的個別化經驗一樣，亞太第四波的區域化成長圈模式，不失為藉此將多數國家從邊陲躍升成為「半邊陲」地位的另一種集體化發展策略。同時，經由此種第四波的轉型，或許也可以加速縮短前三波轉型所帶來的亞太內部的成長差距。

就像菲律賓總統羅慕斯所強調，成長三角應該是一種可掌控的「區域合作發展試驗」，一旦產生任何負面效應，當設法限制於成長圈之內；但是一旦有正面效應，便能擴散至國家整體經濟。這種模式具有區域整合的優點，也不致過度喪失經濟主權。對於較先進國家而言，面臨工資上漲、土地及勞工日益缺乏時，成長三角將是維持競爭力之道；對較後進的國家而言，則可藉此創造就業機會、發展技術、接受技術轉移，並吸取先進的成長遊戲規則。更重要的是，成長三角非常有彈性、成本低廉、快速、單純且焦點明確，不必大費周章即可開動，不像正式的塊狀經濟體常常需要長達多年的醞釀期和複雜的政治協商。

當然，我們相信也更期待亞太區域化成長圈會是亞太第四波轉型的特色，它將會為亞太的整體和個別國家的發展帶來互補和互利的正面成果。但是，正因為它是採取跨國的國際合作途徑，這其中就會涉及如何善處各國之間因為政治意識型態、經濟利益，甚至文化傳統所可能帶來的衝突和矛盾的問題。

因此，在亞太已步入第四波轉型、區域發展的階段之際，所有參與在上述這十多個區域成長圈轉型的相關機構或角

色，包括各國政府、民間社會和國際發展組織（如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在內，都應盡早建立異中求同的區域永續發展共識，此一區域永續發展的轉型共識，應包括以下幾個原則：

（一）區域成長圈是在尊重各國獨立政治和經濟主權的大原則下，所進行的實質互惠合作發展策略，國與國、區域與區域之間應建立平等和相互尊重政治實體存在的「新主權觀」，不應再次陷入傳統國際政治霸權爭奪、衝突和矛盾的舊框框。

（二）區域成長圈的建構應同時審慎考慮到近期經濟成長效益和長遠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的動態平衡原則，不應爲了近利所做大舉開發之際，而破壞亞太各個區域內的生態體系和資源，或導致大規模的污染危機。

（三）區域成長圈的促成也應審慎尊重和保護亞太各國、各區域內原有文化良善風俗傳統，不應爲了迎合外資和可能帶來優勢異文化的入侵，而傷害或扭曲既有的文化傳承。

（四）區域成長圈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福祉，應嚴肅規劃妥善的社會政策，使其能公平地供成長圈所在地的社會各階級和各族群所分享，甚至還應藉此平衡，而非加大，當地國內已有之階級、貧富、族群之間的差距。

總括說來，以上這四個永續發展的原則，分別是「政治實體平等的原則」、「經濟成長和環境保護平衡的原則」、「相對文化觀的原則」，以及「經濟社會正義的原則」。

也唯有各參與國（和私人企業）都能恪守以上四個永續發展的原則，亞太第四波轉型的區域成長圈模式，才會真正在廿一世紀爲亞太帶來整體躍升的淨善果，而避免再重覆前三波以國爲躍升發展策略，在各國所產生的種種環境破壞、社會不公和文化扭曲的後遺症。跨國和跨區域合作的真諦就是透過上述永續發展的新共識，以區域成長圈的空間發展模式，走出與前三波不同的發展轉型道路，而非淪爲跨國（政府）（財團）聯手，加速環境生態的破壞惡化、社會的不平等，和深化外來文

化對當地文化的扭曲作用。對此永續發展新共識的堅持，和確保各個區域化成長圈確實依循上述四個原則來帶動亞太第四波的轉型，甚至樹立亞太未來發展的新典範，本文上述所提到的亞太各國「民間社會」就應扮演著持續監督、匡正和制衡的角色，甚至與區域化成長圈和合作模式同步發展出「區域化民間社會」的攜手合作新策略，在區域化政治力（政府）和經濟力（財團、企業）之外，組成「區域化的民間社會力」結盟，在二十世紀末的未來幾年就開始以具體的策略和作法引導二十一世紀的亞太社會轉型，使其能真正走上永續發展之路。

參考書目

- 〈大湄公河流域孕育無窮商機〉，《工商時報》，1995年12月15日。
- 〈成長三角具有發展成功機會〉，《工商時報》，1994年7月23日。
- 〈成長三角具經貿潛力〉，《工商時報》，1995年12月11日。
- 〈經濟發展超越國界：亞太成長三角迅速崛起〉，《工商時報》，1996年8月19日。
- 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1994），〈中華民國的南向政策〉，《中山社會科學學報》，第八卷第三期，秋季。
- 丸山伸郎編（1992），《華南經濟圈》。東京：經濟研究所。
- 許介麟，李文志，蕭全政（1991），《台灣的亞太戰略》。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 廖光生編（1991），《兩岸經濟發展與亞太區域互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Aikman, David (1986). *Pacific Ri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Berger, Peter (1986).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rger, Peter and Michael H. H. Hsiao (eds) (1988).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Brandon, Carter and Ramesh Ramankutty (1993).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for Asi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Ho, K. C. and Alvin Y. So (1995). "Semi-periphery and Borderland Integratio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Experien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Hofheinz, Roy and Kent E. Calder (1982).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 Howard, Michael C. (ed.) (1993). *Asia's Environmental Crisi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Hsiao, H. H. Michael (1992). "Explaining the Taiwan Development Model: Lessons to be Learned," in *The Role of Market and State: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s in East Asia and East-Central Europe*, edited by D. C. Kim, et al., pp. 127-47. Seoul: 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 Hsiao, H. H. Michael (1995). "The Civil Society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198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s of Values in Civil Society, Bertelsmann Foundation and the Club of Rome, Berlin, September 23-24.
- Hsiao, H. H. Michael and Alvin Y. So (1993). "Ascent Through National Integrations: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Taiwan-Hong Kong," in *Pacific-A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System*, edited by R. A. Palat, pp. 133-47.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 Klintworth, Gary (1994). *Taiwan in the Asia-Pacific in the 1990s*. Canberra: Allen & Unwin, and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Kwok, Yin-Wang and Alvin Y. So (eds) (1995). *The Hong Kong-Guangdong Link*. Armonk: M. E. Sharpe.
- Lee, T. Y. (ed.) (1991). *Growth Triangle: The Johor-Singapore-Riau Experienc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Liao, Kuang-Sheng (ed.) (1993). *Politic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cCord, William (1991). *The Dawn of the Pacific Centur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Naya, Seiji and Akira Takayama (eds) (1990).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calapino, Robert (1994). 〈區域貿易集團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未來角色〉, 《國策雙週刊》, 第八十期。
- Seda, Maria (ed.) (1993).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ASE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hambaugh, David (ed.) (1995). *Greater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ngh, Daljit (ed.) (1995). *Regional Outlook: Southeast Asia, 1995-1996*.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o, Alvin Y. and Stephen W. K. Chiu (1995).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Tau, Abbey Gemini (1994). "Regional Growth Triangles in Southeast Asia,"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Germa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o. 3: 28.
- Thambipillai, P. (1991). "The ASEAN Growth Triangle: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Interest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 299-314.
- Tien, Hung-Mao and Yun-Han Chu (1993). *The Asian Regional Economy*.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Hong Kong: The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Tiryakian, Edward (1985) "The Changing Centers of Modernity," in *Comparative Social Dynamics*, edited by Erik Cohen, et al., pp. 131-47, Boulder: Westview Press.

Tiryakian, Edward (1990). "On the Shoulders of Weber and Durkheim: East Asia and Emergent Modernity," in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K. D. Kim and Su-Hoon Lee, pp. 3-25, Seoul: Panmun Book Co.

Yamamoto, Tadashi (ed.) (1996). *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sia-Pacific Transformation, Regional Growth Triangl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ichael Hsin-Huang Hsiao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experienced four waves of unprecedented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first wave started with the Japa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1960s, followed by the economic miracle in East Asian Four Little Dragons (Taiwan, South Kore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since the late 1970s. The third wave of transformation was witnessed in the rising growth potentials of coastal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beginning in the 1980s and the fourth wave saw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regional growth triangle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within Asian Pacific.

This paper traces the first three waves of the Asia-Pacific great transformation and how Asia-Pacific's overall image has been lifted as a result. The accompanied rise and its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different Asia-Pacific nations are also delineated. It further assesses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eleven emerging regional growth triangles that highlight the fourth wave of Asia-Pacific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e new paradig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four distinctive guiding principles is proposed. It is envisioned that a regional civil society alliance be formed in order to direct the fourth wave of Asia-Pacific transformation unto its road to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also expected that the empowering "regional social force" can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check and balance with the already powerful "regional political force" of stat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force" of capitalists on the future path of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